

美中相互驅逐記者對未來兩國關係之觀察

林廷輝*

由於美國政府懷疑包括「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及「人民日報」等五家中中國官方媒體駐美記者，並非專門從事新聞專業，而是夾雜特殊任務，特別是為中國政府蒐集情報，因此將之視為「外國使團」，要求這五家媒體的 60 多名記者，在 2020 年 3 月 13 日立即離開美國，且由於美國政府並沒有給予這些中國記者從容離開的時間，中國外交部對此感到不滿。

3 月 18 日，中國要求美國媒體《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等記者，只要原本申報記者證到今年年底前到期的，必須在 10 日內交還記者證，共計 13 名記者受到影響；¹ 至於引爆中國政府決定驅逐美國記者的導火線，表面上是來自《華爾街日報》刊登美國學者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的一篇評文—「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² 但實際上與美國

*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¹ 被驅逐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包括北京分社副社長李肇華 (Josh Chin) 和鄧超 (Chao Deng) 以澳洲人溫友正 (Philip Wen) 等三人。

²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3,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doi: 10.30382/SSA.202004_(161).0001

政府驅逐中國記者的事件有關。由於中國認為中華民族受到羞辱，早已將《華爾街日報》視為眼中釘，原本就有驅逐該媒體記者的計畫，《華爾街日報》刊登米德的評文是在2月3日，一個多月後，中國政府才採取驅逐美國記者，由於米德是學者身分，並非代表官方發言，倘中國政府因此理由而驅逐美國媒體，甚至指名《華爾街日報》以外的兩家媒體《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於理不符。

3月24日，三家報社由《紐約時報》的蘇茲伯格(A.G.Sulzberger)、《華爾街日報》的劉易斯(William Lewis)和《華盛頓郵報》的瑞安(Fred Ryan)等聯名發表公開信，表示在全球對抗「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時，中國政府的舉動有害且魯莽，同時認為這個決定是對美國政府近期驅逐行動的報復，指出媒體是美中兩國政府外交爭端的附帶損害。在一個如此危急的時刻，可能會讓世界無從獲得一些至關重要的訊息。

3月27日，中國外交部分別約談三家報社駐北京分社負責人，就公開信內容提出嚴正交涉，中國表示，三家美國媒體的聯名公開信顯然發錯了物件，有關內容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充滿傲慢與偏見，中國堅決反對，絕不接受。³

此事件看似單純互相驅逐雙方媒體，實際涉及兩國刻正進行的外交角力，由於外界認為這與過往中國政府拉攏或滲透外媒的作法迥異，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利用外國媒體美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輿論與名聲，特別希望獲得美國人民的了解，但今日反而與這些媒體對立，採取驅逐措施，是否

³ 〈外交部新聞司就三家美國媒體發行人公開信向有關媒體提出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網站》，2020年3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t1762597.shtml〉。

代表中國的宣傳系統已不需要對外媒進行公關活動？也是否代表中國足以憑藉自身在海外媒體以及運用社群媒體，轉向經營新媒體，創造新的網路聲量而可肆無忌憚地挑戰舊媒體？中國過往在新聞自由方面的成績並不及格，驅逐美國媒體後是否更加嚴峻，因而碰觸美國價值的底線，而美中關係未來是否因此事件將更加惡化？臺灣應處之道為何？為本文探討重點。

中國「驅逐」美國記者決策的觀察

中國一向對真實報導中國內部新聞的外國媒體並不友善，甚至透過審查稿件、照片與影片，來箝制外國駐中國記者的新聞自由，倘有不從，就可能施以暴力或軟禁，例如現任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副顧問的博明(Matt Pottinger)，先後擔任《路透社》及《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期間，曾被中國政府派來人員打了一拳，試圖阻止他調查一家中國公司向其他國家出售核燃料。

回顧媒體記者在過往美中關係發展中扮演橋樑的角色，1970年，毛澤東透過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向全世界傳達中國希望與美國接觸的訊息，不久之後，眼見美國政府毫無進一步動作，同年12月18日，毛澤東再次會見史諾，直接向史諾透露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的意思。毛澤東對史諾說：「如果尼克森願意來，我願和他談，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遊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隔年7月，白宮國安會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秘密訪問北京，1972年2月，尼克森正式踏上中國，與周恩來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U.S.-PRC Joint Com-

muniqué，又稱《上海公報》)的篇章。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後，媒體效用不減，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便告訴義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毛主席的畫像會永遠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同時北京將歡迎一些資本主義元素。」江澤民為了讓中國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也曾與美國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一同高歌，⁴為得都是透過國際媒體塑造中國正面形象。

《華爾街日報》在刊登「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後，挑起中國內部民族情緒，中國民眾再次回想到清朝末年時中國積弱不振，國力衰弱，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時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其說是生活型態之爭，倒不如說是藉共產主義將西方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創立所謂新中國，但中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生活過得更好。1970年代，由於國際局勢的改變，毛澤東晚年開始向美國示好，鄧小平改革開放引入大量外資，三十多年來的中國充滿追求勞工紅利的外商勢力。為了保護這些外商，國際社會將中國引導進入「世界銀行體系」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簡稱ICSID)，或者簽署雙邊《投資保障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簡稱BIA)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由於中國向《華爾街日報》抗議，並要求其立即更正錯誤，但《華爾街日報》遲遲未能答覆為何刊登「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讓中國共產黨難堪，因而追回記者證，驅逐

⁴ 袁莉，〈驅逐美國記者背後，中國對敘事和宣傳能力的自信〉，《紐約時報》，2020年3月19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319/china-media-reporters-eject/zh-hant/>〉。

該報記者以為示警與懲處。由於《華爾街日報》為了堅守媒體新聞自由，不因政治力的介入，干涉或箝制評論作者的思想自由，因此不道歉與不回應中國政府。美國媒體堅守立場的做法當然可以預期，但等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威。根據「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簡稱 FCCC) 統計，自 2013 年以來，也就是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掌權後，共有 9 名外國記者被驅逐，或者因為延續簽證被拒，而被迫離開中國。⁵

中國此次驅逐美國三大報駐中國記者的舉措，呈現以下幾個趨勢：

一、非全面驅逐外國媒體，僅限定三家美國媒體記者

中國並非驅逐所有美國駐中國記者，僅對《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三大報，具有針對性，對於親中國媒體或在中國眼中認為可以「平衡報導」的美國媒體記者，仍可留在中國採訪新聞。那些無法配合中國的新聞管制的媒體，則喪失在中國採訪的機會與權利。例如 2020 年 4 月 9 日，美國白宮發布聲明批評《美國之音》(VOA) 太常為美國的敵人，而不是人民說話，稱讚中國在武漢的防疫成就，白宮罕見地批評該媒體用美國納稅人的錢為中國宣傳。⁶ 相對來說，《美國之音》就不會被中國政府點名，派駐

⁵ 〈中國驅逐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的時機與世界輿論〉，《BBC 中文網》，2020 年 2 月 1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565476>〉。

⁶ “Amid a Pandemic, Voice of America Spends Your Money to Promote Foreign Propaganda,” *White House*, April 1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amid-a-pandemic-voice-of-america-spends-your-money-to-promote-foreign-propaganda>.〉

在中國的記者不會被驅逐。

二、驅逐的原因是中國認為這些媒體不受控制，破壞「輿論戰」

中國透過自己的官方媒體或共產黨媒體，宣傳中國政策與政績，各國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大外宣」(「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的簡稱)的一環。由中國媒體自我宣傳中國的政策與政績，公信力不高，倘能由外國媒體對中國進行善意解讀，將有助於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然而，如果外國媒體發掘隱藏在謊言之後的事實後，將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執政，這樣的外國媒體屢勸不聽，最後只好將這些記者驅逐出境，喪失第一手報導中國的「權利」。

三、驅逐事件讓中美兩國敵意螺旋不斷升高

驅逐媒體記者只是美中關係惡化中的一個事件，引起中國不滿的評論文章或報導，與此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有關，疫情爆發引發美中政府間、人民之間敵意升高，這也讓美中各自媒體歸隊，撰文嚴格審視、批評對方成為媒體報導內容的主流。雙方各自驅逐某些媒體，並無法降低彼此間報導的敵意，情緒化報導又呈現在兩國民眾面前，導致彼此間敵意螺旋不斷升高。

對未來美中外交關係的觀察

美中關係自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二任後半任期，因為中國在南海擴建島礁，造成區域和平出現動盪，兩國關係出現重大轉折。川普當選總統後，開展美中貿易談判，雙邊關係更為緊張。在第一階段貿易談判於2020年1月15日達成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中國延燒，緊接著歐美開始出現感

染，感染與死亡人數攀升，並超越中國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

美中之間並沒有建立合作共同面對疫情機制，反而落入口水戰。中國方面聲稱病毒來自於美國，美國稱此病毒為武漢病毒、中國病毒，雙方貿易戰也沒有停歇。川普認為中國必須立即執行貿易協議內容，但中國因為疫情，製造業大受影響，內部面臨復工但卻無歐美訂單的窘境，以至於生產出來的物品只能暫時囤積。再加上疫情仍未受到控制，無論是歐美或是中國內需消費市場並未恢復，失業者或無薪假人數大增，美國民選政府無法忽視民意的反彈，兩國關係持續惡化是可以預期的。

美中之間原先建構的「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等四個高層對話，隨著美中首重貿易談判，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這些高層對話機制停擺。原本在2020年1月15日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將重啟「全面經濟對話」，但疫情因素，加上驅逐媒體，以及在防疫過程中，雙方政府發言人在推特(Twitter)爭論，目前並無重啟跡象。

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在3月相互爭論，華春瑩反駁奧塔格斯有關中國難堪地將美國記者驅逐，阻礙疫情重要資訊從武漢流出的言論；⁷此外，中國外交部另一發言人趙立堅也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等語，引起美國總統川普不滿，直接稱呼「新冠肺炎病毒」為「中國病毒」，這不僅悖離了中美外交應有的方向，更引發美中兩國的民族情緒，對兩國關係在疫

⁷ 〈美中外交發言人為疫情推特開戰，臺灣也被提及〉《中央廣播電台》，2020年3月24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56739>〉。

情緩解後恢復沒有幫助。

美中關係在歐巴馬總統後期，川普總統上台後便開始出現諸多齟齬事件，讓兩國關係惡化，驅逐雙方某些媒體記者，是此一趨勢必然發生現象。目前兩國官方發言雖逞口舌之快，尚且停留在 1979 年中美建交以來既有結構中。不過，接下來可以觀察的是，在美中連人道醫療合作對抗疫情的機制付之闕如之下，又該如何讓兩國惡化的外交關係返轉呢？中美未來外交關係發展可從以下幾點觀察：

一、美中關係回到以貿易談判為軸心，達成共識更為困難

新冠肺炎與驅逐媒體，不會影響目前美中關係的整體發展，特別是美國試圖扭轉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善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國際社會掠奪資源。這些掠奪包括對歐美研發專利的剽竊、不尊重商標與市場規則、以國家資本主義造成不公平現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資投資的限制、國營企業的阻撓、未開放金融、保險、服務業等市場，使美國在諸多利益受損。

因此，川普在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後，持續以第二階段貿易談判為中美關係的軸心，此階段美國原本規劃迫使中國在貿易與內部商業體制進行改革，中國是否因此而就範，間接影響中國內部政治改革。須持續關注雙方僵局是否造成世界經貿復甦更加困難。

二、中國藉機擴張軍事勢力，雙方軍事對峙恐無法避免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歐美國家為處理各自內部的疫情問題，重整衛生醫療體系，可能在預算上排擠原本對外軍事活動，轉而將首重內政。對中國來說，內政最重要的在於維穩，而因為疫情因素，歐美市場尚未復甦，造成中國「世界工廠」

訂單無法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狀態。

中國領導人將思考，在對外作為上以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為理由，採用民族主義團結中國人民，特別在海權、空權的拓展上，中共認為歐美國家自顧不暇下，不會干涉中國的對外擴張行為。中國將藉機擴張軍事勢力，而引起美國不滿。雖然諸多航空母艦紛傳疫情，美國開始重新部署人員，但面對中國擴張之際，可預期的是，美國將採取諸多反制措施，雙方軍事對峙（例如在南海軍艦對峙，或在臺灣周邊海域軍機相遇等）恐怕無法避免。

三、中國將強化與俄羅斯及「帶路倡議」沿線國的關係

由於中美關係在疫情過後仍無法好轉，驅逐媒體記者事件後，兩國外事部門發言人惡言相向，關係更加惡化，各國藉由疫情造成的損害，在英、美等國訴諸法律與政治手段下，向中國施壓並要求賠償。使中國遭逢 1971 年進入聯合國後，除了 1989 年天安門學運外，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批判」。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下，中國只好轉向歐亞大陸，特別是強化與中亞國家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同時加大力度投入「帶路倡議」沿線國資源，以拯救國內停滯的經濟發展，避免在國際社會受到孤立。

政策建議

對於美中相互驅逐某些媒體記者，造成兩國往後在媒體詮釋與論述上，朝益加強硬的方向進行。兩國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不高，加上疫情結束後，緊接著美國檢視中國在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承諾，進入第二階段貿易談判的衝突，將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對立，非僅經貿數據的差異。在此背景下，建

議臺灣政府可有以下幾點作為：

一、臺灣應把握對中國的「詮釋權」

由於美中相互驅逐媒體記者，雙方要達到客觀報導並不可能。中國是一個訊息封閉的社會，中國共產黨只要對其不利的新聞或傳言，必用盡辦法封殺。例如新冠肺炎當時的吹哨者李文亮醫生就被要求三緘其口，在李文亮醫生因染新冠肺炎辭世後，中國共產黨為避免民眾反彈，除在形式上對該案進行調查外，也在2020年4月4日清明節對李文亮醫生及其他病逝的患者悼念，不過仍不會改變中國封閉的體制。

臺灣是世界上最了解中國的國家，不僅僅在政治、經濟，更在民情、政情與政治人物的特性等等，觀察較為深入，因此，當美國媒體記者被驅逐離開中國後，由於在臺北並不缺乏這些媒體的駐點記者，無須要他們將駐地從北京轉往臺北，但可以和與這些媒體合作。既然中國對外解讀自我刻意隱瞞，臺灣更有空間成為詮釋中國的世界中心，不僅提高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更可凸顯臺灣是研究中國的重鎮。

二、提供各國來臺學習應對中國「大外宣」的威脅與反制措施

中國為了執行「大外宣」，在全世界各地布局各類型媒體甚久，不過近年來已被識破其意圖，許多國家明白這些中國媒體背後的官方色彩，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更加清楚中國「大外宣」的目的。認為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該官方派駐海外媒體，如何秉持公允報導，對中國媒體採取進一步的抵制？

當「大外宣」失敗後，各國驅逐中國官方媒體的做法會排山倒海而來，中國亦可能採取相同的反制措施，驅逐更多外國媒體。臺灣有充足經驗應對中國的「大外宣」，未來各國可

能來臺向我國取經，了解過去臺灣的相關應對方法，學習接下來如何應對中國的反制措施。

三、慎防中國對臺施加更大壓力，製造兩岸關係動盪，企圖轉移美國與國際關注貿易體制、新聞自由與人權議題的計謀

由於中美關係不睦，當中國無法應對美國及國際社會抵制時，可能遷怒臺灣，加大對臺灣的施壓，此對中國決策階層有兩個好處：其一為團結內部，認為臺灣有外國勢力介入，喚醒民族意識，激起中國民眾情緒；其二為轉移焦點，原本美國與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政治自由、新聞自由而來，中國在國際社會透過「一個中國」與對臺政策，早已表明自身立場，因此，對臺採取任何軍事活動與壓制措施，都可轉移原本議程設定與排序，緩和中國在其他議程所面對壓力。

此際，臺灣政府應採取相應措施，面對中國的軍事活動與高壓手段，展現足以反制的能力與措施，例如在中國軍機與軍艦繞臺之際，臺灣國軍單位在4月中於臺灣東部試射各種「中程飛彈」，其中包括射程約1,500公里的雲峰飛彈，便是對中國軍事活動的反制，讓中國不敢對臺灣輕舉妄動，進而破解中國製造兩岸關係動盪的計謀，試圖讓美國與國際社會焦點專注在兩岸關係的穩定，而轉移集中施壓中國應對貿易體制、新聞自由與人權等議題的壓力。